

科学社会主义
活页参考资料
(24)

校内用书

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政治系资料室

说 明

近年来，对社会党国际的活动和研究，越来越引起国内学者们的关注。因而急需广泛的和从不同角度对社会党国际的研究资料。

这本《社会党国际简史》的特点是，社会党人自己撰写自己国际的历史。它提供的资料和观点有助于我们对社会党国际的研究，对于了解它们，有一定参考价值。

这本书是西德社会民主党为对普通党员，特别是青年人进行传统教育的历史丛书中的一种。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的：“我们著书不是为历史学专家们的，而是为对历史感兴趣的读者，特别是那些年轻的读者。”

作者在写作时曾得到社会党前总书记、《国际的历史》一书的作者尤利乌斯·布劳恩塔尔的指导。社会党国际的现任主席维利·勃兰特为本书写了序言。这些都说明社会党国际的领导人对于撰写这本书的极大重视。

这本书也提供了一些新的资料，尽管不算太多。如关于袖珍国际的历史等，对于研究社会党国际的历史有一定参考价值。但有些观点，我们是不能同意的。如关于社会党同共产党的关系、关于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政策的论述等等。总的看，由于作者是站在社会民主党的立场，所以粉饰社会民主党人，这是很自然的，但对共产党人恶毒攻击性言论较少，客观叙述较多。

作者把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作为自己历史的先驱，把社会党国际看作是它们的直接继续。1964年社会党国际还专门召开了庆祝第一国际成立一百周年大会。这可能就是维利·勃兰特在本书序言中所说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国际运动，也没有必要放弃它们的长子继承权”一语的真谛。也就是把自己打扮成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正统、“合法”继承人。

这本书是由序言、引言、导论和十二章正文构成的。是由裴晟、黄中华两同志根据德文本译出的。两位同志都是中国人民大学原科学社会主义系78级的毕业生。黄中华同志译了三章（九、十、十一章）其余部分是裴晟同志翻译的。在翻译过程中，我的研究生张小劲同志曾给予大力协助。他们都是初步学译，译文水平不高，仅供有关研究者参考。

原书的附录，因多已译出公开发表，故略去未译，以节约篇幅。

黄 安 森

1981年4月

社会党国际简史

(上)

目 录

序言·····	1
引言·····	4
导论：国际——主要是一种思想·····	5
第一章：“全世界无产者……”·····	8
——国际工人运动的形成	
第二章：“一个为了人类幸福的愿望”·····	16
——国际工人协会的建立	
第三章：“……分歧造成的分裂”·····	30
——围绕着纲领的斗争	
第四章：“……关系到国际的存亡”·····	42
——分裂与失败	
第五章：“国际无产阶级的联盟”·····	60
——第二国际	

序 言

国际自成立以来，它所进行的斗争始终伴随着两种传说：一是朋友们和敌人都过高地估计了国际的影响能力，把国际看成是一个秘密的世界性政府或一个危险的全球性阴谋集团。因此，国际工人协会在它创立之年便遭到了刽子手的迫害。二是朋友们和敌人都低估了国际的作用，认为国际是一个没有权威，也没有什么影响的辩论场所，这样一种评价对国际最重要的一部分职责似乎还有些合适。

这两种过激的认识就给国际下了一个国际本身并没有也不可能下的定义：国际是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指挥中心。国际的各成员党的发展历史是很不相同的，它们的利益也有较大的差异，因此，为了能够摆脱曾经象前面所说的那样的国际——这个社会主义的世界性机构，它们总是很强烈地把独立的愿望同祖国联系在一起。这种努力也许已经对传统造成了破坏。

但是，国际可以或者应该做些什么呢？它应该在什么范围发挥自己的作用呢？它目前的任务又是什么呢？

先辈们根据国际的性质得出——社会党国际应该是一个出自共同信念而建立的、有威望的党的共同工作机构，这也是因为国际有时能够利用自己有限的权力做一些事。国际的协作不是命令或脱离实际的多数决定，而是道义的支持、经验的交流和寻求共同的答案。

协作是不容忽视的。因为，当人们能够借助于好友们的帮助时，寻找我们世界问题的答案就会变得相当容易。为什么瑞典人在他们国家得出的经验就不能为德国人所借鉴呢？为什么要放弃讨论能源问题或放弃在国际范围——也是非官方渠道——讨论劳动市场政策呢？当来自世界其它地区的朋友们准备并且有可能介绍他们的社会主义模式时，欧洲人和美洲人为什么就不可以仔细听一听呢？恰恰在去年，特别是在保卫和平的积极努力中，这种各成员党的领导人之间的思想交流和经验交流被证实是有用的。思想交流和经验交流所导致的对冲突的调解，也多次证实了这些交流是各国对外政策的有益补充。因此，这种交流应该进一步得到加强。

当前，社会党国际的一个更远大的重要任务就是：从欧洲的顽固思想中进一步摆脱出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的这个新时期里，争取一些来自第三世界的党与国际合作或加入国际的工作已经有了成就。尽管这些党所选择的信念是不相同的，出自于它们的经历，它们所走的道路也是可理解的，但是，当它们对议会民主的看法同我们相一致时，就要看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能否找到向它们开放的可能了。社会党国际的讲坛是属于来自所有大陆的民主社会主义者的，为了更加灵活地同其它许多党进行合作，有必要寻找一种适当的形式。

对于各种参加者来说，一个学习过程是必要的。我们这些发达国家的人应该去倾听那些来自于饥饿和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的、年轻的党的呼声。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抛掉也许我们至今尚未认识到的偏见。只要社会党国际准备向新意识开放，并且对各种新道路不加限制，它就将会遇到愈来愈大的挑战。

下面列举四条任务：

——国际必须回答怎样才能持久地保持世界和平。在过去几年中，缓和政策是有进展的，实现和平也更有希望了。但是，现在世界上每年仍有大约3000亿美元的军备开支，还有无法估计的、每天都可能引起战争的领土纠纷。国际和它的成员们在缓和破坏和平的紧张关系方面发挥了不小的作用，这在由它们执政的国家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国际将继续推行这个政策。

——国际也要回答如何才能协调南北关系，以便使穷国和富国之间悬殊的差距得到弥合，使贫穷地区的人民不再挣扎于饥饿之中。对此，不讲空话，根据一个能够被第三世界（和第四世界）的朋友们接受的适当的解决办法去工作也是必要的。

——国际还应该回答在工业国家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时期，如何才能保住已经取得的进步，如何能在社会民主方面有所突破。从一系列事件中可以看出，在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国家中，都显示出它们比其他人有能力，在国际关系上它们显得特别明智。

——国际特别要回答如何能在世界各地实现人权。如不提出一个最高的要求，这个过程将是长期的和艰难的。但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国际运动也没有必要放弃它们的长子继承权。同过去一样，今天仍要用团结代替利己主义。

目前，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在经历了长达几十年之久的残酷迫害和压制以后，人权又重新得到重视，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在这些国家中也重新建立起来了，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信号。但是，青年人应该懂得，还有许多事等待我们去做。

维利·勃兰特

引 言

《社会党国际简史》概括了社会党国际的产生和它的活动以及它的过去。著者的目的在于把手头内容极丰富的资料简练地叙述出来。我们著书不是为历史学专家的，而是为对历史感兴趣的读者，特别是那些年轻的读者。在资料的精选中，尤利乌斯·布劳恩塔尔给我们以启示，他在其代表作《国际的历史》第一卷导言中曾写过：“国际的历史是社会主义政党理论和政策中的社会主义思想精神结晶过程的历史。”他在完成《国际的历史》第三卷后不久就去世了，享年八十岁。假如没有他的著作，那么我们这部书是写不出来的。布劳恩塔尔作为观察员、撰稿人，最后作为总书记在国际中工作了六十年之久。

对海拉·德迈尔以及霍斯特·海德曼给本书的鼓励，特别是苏珊·米勒大量的鼓励和合理的建议，以及薇罗妮卡·伊森贝格、维尔娜·克劳斯、海因茨·普茨拉特、托马斯·米罗给我们的极有价值的其它提示，著者均表示感谢。

特别要感谢为我们审阅手稿并撰写了导言的维利·勃兰特。

卡尔·路德维希·报舍
克劳斯·兰特曼

导论：国际——主要是一种思想

“社会党国际不仅是一个组织，而且更主要的是一种思想。”^①在参加1976年11月26日社会党国际主席选举的前夕，维利·勃兰特用这句话同时概括了社会党国际的弱点和优点。社会党国际的组织形式一再被证实是它的弱点，这种组织形式恰恰在社会党国际不常见的危机时期很难将国际召集起来。社会党国际的优点就在于它的基本思想，尽管国际内部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和无情的压制，这种思想依然存在，每当敌人甚至是朋友都谣传国际已经灭亡时，它又把国际的组织重新集合起来了。

这种思想是根据1789年法国革命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而提出来的，对于既没有政治权利，又受到警察统治残酷迫害，从工业革命开始就遭受剥削的无产阶级来说，“自由、平等、博爱”成为希望和号角。这个口号第一次把关于社会变革必要性的讨论从书房、从沙龙和19世纪初工会中出现的玄奥的俱乐部里搬到了纺织车间、新型机器工厂和钢铁厂中。

在英国，在18—19世纪之交工业就已经迅猛增长，在1788年到1806年之间，钢铁生产增长了三倍。在纺织工业中，机器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使用。迅速的工业化通过铁路促进了国土的开发。

相比之下，德国的工业直到19世纪初仍处在初级阶段，

尽管也已经出现了一个工人下层，即除了自己的后代之外什么都没有的“无产阶级”，^②这个社会阶层包括小手工业者、农业工人和工厂工人，他们的人数迅速增长：在普鲁士，这些不能自立并且收入微薄的手工业者从1801年的11万人增加到1858年的50万人以上，同时，又有大约50万人进入了工厂，这就加剧了工厂与手工业者的竞争。^③手工业者不得不以延长劳动时间，让自己的妻子孩子工作以维持生活，或者为了生活而流落他乡。1844年，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举行了反对饥饿和商人剥削的起义，但遭到了残酷的镇压。

许多直到当时仍独立的手工业者，为了至少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尽管收入少得可怜，还是进了工厂。在工厂里他们又遇到了出卖了自己无利可图财产的小农和希望得到点什么的短工。这种不断增长的寻找工作的浪潮使企业主又得以不断地恶化劳动条件：工作时间长达17小时，付给只能维持最低生活的工资、使用童工和提供相当差的住房。同时“实物工资制”又在工人对企业主的依附性方面给予了保证：工资在形式上为昂贵或过贱的商品所代替。^④

1839年，企业主的儿子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他的第一篇政治性著作《乌培河谷来信》这一组文章中抨击了他家乡的这种情况：“在低矮的房子里进行工作，吸进的煤烟和灰尘多于氧气，而且从六岁起就是这样，这就势必要失掉全部力量和朝气。单干的纺织工从早到晚蹲在自己家里，躬腰曲背地坐在织机旁，在炎热的火炉旁烤着自己的脊髓。这些人的命运不是神秘主义，就是酗酒。”^⑤

六年以后的1845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不再只是描绘工人的社会状况了。在资本主义的中心——英国，他分析了

“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并得出结论：“要想和平解决已经太晚了。阶级的分化日益尖锐，反抗的精神日益深入工人们的心中，愤怒在加剧，个别的游击式的小冲突在扩展成为较大的战斗和示威，不久的将来，一个小小的推动力就足以掀起翻天覆地的浪涛。”⑥

注 释：

- ① 1976年11月24日维利·勃兰特同记者的一次谈话。
- ② “无产阶级”这个概念出自于拉丁文的“proles”，原意为“后代”。
- ③ 参见《政治教育消息》1975年9月，164期，12页。
- ④ 参见黑尔加·格雷宾：《德国工人运动史》，1976年慕尼黑第7版，20页。
-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498页。
-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587页。

第一章：“全世界无产者……”

——国际工人运动的形成

1848年给当时还十分弱小的工人运动指明了前进的道路，这就是实现运动的目的“自由、平等、博爱”。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这一年的2月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它的中心任务是向正在建立的工会、秘密团体及手工业者组织指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因为只有当全世界受苦的工人阶级超越国境地团结起来的时候，他们才能象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那样——打倒剥削者。

虽然《共产党宣言》原来只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但是，他们通过《宣言》告诫所有正在建立的工人组织说：“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部分。……总之，共产党人到处都在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最后，共产党人到处都在努力争取全世界的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议。”^①同这个纲领一起出现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是社会党国际意义最大、表现最丰富的先驱之一。

一、共产主义者同盟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出现是一系列秘密团体分裂和瓦解的结果，这些团体虽然较小，但都有跨地区的组织。最初，流亡在巴黎的德国知识分子和手工业工人在1834年建立了“流亡者同盟”，这是一个仅在理论上讨论社会主义政策而并不付诸实践的秘密组织。1836年，“正义者同盟”从这个组织中分裂出来了。“正义者同盟”的章程规定的目的是：“把德国从不光采的压迫枷锁中解放出来，并建立一个人们有很多义务，但不再有痛苦和压迫的社会。”②

“正义者同盟”强调了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所有参加这个秘密组织的人都必须宣誓：“我们要成为自由者，也要使在地球上生活的每一个人都象我们一样自由。”1939年5月12日，同盟的领导成员在巴黎市郊的圣丹尼思和圣马丁两条街道上参加了武装起义。起义被镇压以后，一些盟员被捕了，另外一些被驱逐出境。被逐的盟员来到伦敦，并以“正义者同盟”伦敦分部的名义建立了一个新的组织。因为英国有结社和集会的自由，因此它不再是秘密组织，而是一个公开的社团。这个新组织的名称是“德国工人教育协会”。

由于斯堪的纳维亚人、荷兰人、匈牙利人、捷克人和一些俄罗斯人也参加了这个新组织，不久它就改称“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协会的会员证用十二种文字印着一句格言：“人人皆兄弟”。当时，“正义者同盟”除了伦敦的工人教育协会之外，在瑞士、法国和德国也有分部。

在1845年夏天以前，马克思同众多的社会主义者秘密组织并没有什么接触。这年夏天他访问伦敦时才同“正义者同

盟”建立了联系。尽管马克思批评同盟的路线是模糊不清的思想体系，但他仍把同盟看成是在理论上训练工人和普及共产主义宣传的场所。1847年他接受了委托，为同盟起草一个明确的、建立在社会形势分析基础上的纲领。^③

这个纲领就是《共产党宣言》，它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提交给1847年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并在1848年1月公开发表的。他们为什么把这个纲领称为“共产主义的”而不称“社会主义的”呢？“正义者同盟”为什么在1847年6月改称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呢？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90年德文版序言中作了解释：“在1847年，社会主义意味着资产阶级的运动，共产主义则意味着工人运动。”^④尤里乌斯·布劳恩塔尔也解释了这两个概念：“‘社会主义’在当时被认为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的代名词，它存在于工人阶级之外，是号召‘有教养’阶级的，‘共产主义’这个彻底的社会变革思想的代名词才是召唤工人阶级的。”^⑤

共产主义者同盟希望在理论上成为一个辩论场所，代表一种强有力的宣传要求，并且第一次把国际团结的思想作为目标和任务在一个年轻的工人运动组织纲领中介绍清楚，这作为一个自立的政党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为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分析：“随着资产阶级的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隔绝和对立日益消失了。无产阶级的统治将使它们更快地消失。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⑥

1848年春天革命时期，欧洲工人阶级“联合行动”的可

能性似乎第一次有了实现的可能：在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势力建立的联盟中，民主共和运动的胜利在短时间内似乎是显著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欧洲实现了出版和集会自由的形势下，共产主义者同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1848年夏天，尽管其他领导人反对，马克思仍宣布解散同盟。^⑦

欧洲革命被镇压以后，1849年秋天，马克思在伦敦又重新建立了同盟。由于对自由主义者软弱方针的失望，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建立一个“独立的、秘密和公开的工人政党组织”，“用各种猎枪、火炮和弹药”武装起来，并且在“不断革命”的思想指导下把无产阶级引向胜利，是工人运动的唯一出路。马克思认为：那种“抽象的、在真空中制定政策”^⑧的策略是站不住脚的。由于对资产阶级政策的不满，他把这种策略看成是与反动派勾结，但是，他也认为这与背叛是有区别的。

关于新的革命现实可能性的讨论致使同盟出现了裂痕。一部分人认为，一场新的革命是必然的，同盟应该以此为中心来制定政策。以马克思为首的一派称这种观点是“革命儿戏”。马克思指责“革命派”说：“我们对工人说：不仅为了改变现存条件，而且为了改变自己本身，使自己具有进行政治统治的能力，你们或许不得不再经历十五年、二十年、五十年的内战和国际冲突，而你们却相反地对工人们说：‘我们必须马上夺取政权，要不然我们就躺下睡大觉’。我们特别向德国工人指出德国无产阶级不够成熟，而你们却非常粗劣地向德国手工业者的民族感情和等级偏见阿谀逢迎，当然这样做是比较受欢迎的。”^⑨在原则的分歧上，同盟的两派都表示没有调和的余地，因此作出了分裂的正式决议。

“革命派”在分裂后自称是社会民主主义者。而共产主义者同盟则开始了“向协会进军”。共产主义者同盟人数太少，无法取得广泛的影响，因此，同盟的盟员们有意识地渗透到工人教育协会、体操协会和歌咏协会等组织中去。同盟的政治目的没有变化，仍是利用互通情况和宣传鼓动来准备和发动一场当今社会的革命变革。但同盟的方法有所变化：同盟的盟员注意了自己在现存的工人运动组织中的实际影响范围。布劳恩塔尔就这个新的策略讲过：“共产主义者同盟从不是一个群众组织，这个小团体的成员按章程规定负有‘信仰革命和大力宣传革命’的义务，他们作为社会主义的信仰者影响着工人教育协会、体操协会和歌咏协会，也影响着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和麦伦堡的农民协会和短工协会，这样，人数相对较少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功地在广大工人群众中传播了社会主义思想”。^⑩

马克思的这个策略引起了当局的重视。它用残忍的手段来迫害共产主义者同盟，使同盟为了摆脱警察的追捕而不得不采用熟练的地下活动方式。然而，1851年同盟的领导人之一，柏林的裁缝工人彼得·诺特柴克在莱比锡受到盯梢继而被捕。警察从他身上搜出了宣传材料和一份同盟最高领导人的住址名单，于是，便开始了一场大搜捕。经过十八个月之久的拘留候审和一次逐渐成为法律丑闻的诉讼之后，1852年11月，七名同盟盟员在科伦被判处长期监禁。不久以后，马克思解散了同盟。

后来，恩格斯在评价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意义时说：“从1852年科伦共产党人被判决时起，便结束了德国独立工人运动的第一个时期。这个时期现在几乎已被遗忘。但它从1836

年起持续到1852年，并且随着德国工人在国外的散布，这个运动差不多在一切文明国家中都被展开过。而且还不仅如此。目前的国际工人运动实质上是当时的德国工人运动的直接继续，那时的德国工人运动一般说来是第一次国际工人运动，并且产生出许多在国际工人协会中起了领导作用的人。而共产主义者同盟于1847年在《共产党宣言》中写在旗帜上的理论原则，则是目前欧洲和美洲整个无产阶级运动的最牢固的国际纽带。”^⑩在诉讼案十二年后的1864年，第一国际即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五位受到尊敬的领导人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格奥尔基·埃卡留斯、卡尔·普芬德尔和弗里德里希·列斯纳被选入总委员会。

二、国际协会

共产主义者同盟虽然在社会党国际的先驱中最为清醒地认识到并且强调了各国工人运动团结的必要性，可是，同盟却没有力量把这个认识变成一个国际性的、不局限于互通情况联系的工人国际组织。

在以后的几年里，曾多次进行了已为欧洲所有社会主义领导人正确认识到的国际团结的试验，但是，除去组织上的缺点，这些试验大多都失败于没有能力形成一个对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统一领导。

因此，1852年，由于领导人对能否用革命手段推翻欧洲产生了分歧，英国的“民主兄弟会”消失了。1854年英国宪章主义者^⑪曾希望同工会在“穷人议会”中联合起来，但是，他们缺乏代表工人利益去反对国会的组织能力以及号召